

熊月之 周 武 主编

圣约翰大学史



History of
St. John's University

上海人民出版社

熊月之 周 武 主编

圣约翰大学史

History of
St. John's University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约翰大学史/熊月之,周武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978 - 7 - 208 - 06635 - 9

I. 圣... II. ①熊...②周... III. 圣约翰大学—校史—研究 IV. G649.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6597 号

责任编辑 孔令琴 曹培雷

封面装帧 王斯佳

美术编辑 甘晓培

圣约翰大学史

熊月之 周 武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39 插页 4 字数 590,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6635 - 9/K · 1270

定价 58.00 元

序

张仲礼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它创设于 1879 年,1952 年被裁撤,在它存在的 73 年中,曾经寄托着中国许多学子的憧憬和梦想,培养出一大批各界精英。有人对《密勒氏评论报》1933 年出版的英文《中国名人录》作过统计,发现它收入的 960 人中,有 620 人的简历列有在本国上过的学校,其中曾在圣约翰就学者占 61 名,居各校之冠。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圣约翰大学的历史讳莫如深。虽然过去圣约翰大学校方和校友曾编写、出版过一些有价值的著述,如 Mary Lamberton 所著 *St. John's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自编的《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以及 1938 届校友汪统所撰《著名大学圣约翰》等,但那只是有关圣约翰大学概况的介绍,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认识的调整,教会的历史,自然也包括教会大学的历史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等,都有相当篇幅论述教会教育,其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圣约翰大学。由于圣约翰大学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有些学者还对圣约翰大学进行了专门的研讨,比较重要的有罗苏文的《论圣约翰模式》(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 年第 3 期),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徐以骅、韩信昌合著的《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上述成果虽各有侧重,为进一步研究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并不足以展现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全貌。

本书作者在充分挖掘圣约翰大学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穷数年之力,完成了这部 50 多万字的《圣约翰大学史》。这部著作将圣约翰大学的历史放到中西文化交流和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双重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论述,采取纵向与横向并举的方式来展现圣约翰大学从一所普普通通的洋学堂发展成为一所学子趋之若鹜的顶尖名校的历程。纵向研究,意在展示圣约翰大学从创校到最终被裁撤的特殊轨迹及其阶段性;横向研究,选择圣约翰大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层面,如管理系统与管理实务、系科结构与课程体系、英文教学与国文教学、校园与校风、社团与刊物、教员与校友风采等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借以说明圣约翰大学的独特性,以及圣约翰大学之成为顶尖名校的深层原因。

这部校史不仅资料翔实,而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

一、作为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设的一所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历史是与西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创设初衷就是为了推进教务,扩大圣公会在中国的影响,因此说它是“传教的媒介”并不为过。但是,圣约翰大学并不是一个神学院,而是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神学教育从来不占主导地位,相反,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学校的发展,圣约翰大学的宗教气氛越来越趋向淡化,系科结构和课程体系则越来越世俗化。

二、圣约翰大学设立于上海,它的存在和发展,又与上海城市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可以说它是在上海城市快速迈向现代工商都会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崛起和繁荣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根本上影响了学校规模、系科结构和课程设置,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上海塑造了圣约翰;但圣约翰崭新的教育理念,先进的办学模式,以及它所培养出来的知识精英又为上海的发展与繁荣注入了新的力量和新的内涵。

三、圣约翰大学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的英语教学、体育教育和系科知识体系,也包括它一系列管理制度,如教授会制度、学生自治制度等,对中国而言,都是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不仅改变了中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大学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西学之外,圣约翰大学并不排斥国文教学和国学教育,因此,在它的课程设置中也给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甚至还设立了“孔诞日”。在这个意义上,圣约翰大学又可以说



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四、圣约翰大学的成功,与长期主持校政的卜舫济务实、开明的办学理念 and 办学努力是分不开的。卜舫济是一个传教士,但他更是一个教育家,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圣约翰大学,他倡导的英语教学运动,他的募款能力,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最终都化成了圣约翰大学的特色。

五、当然,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在“非基运动”和民族主义的洗礼下,圣约翰大学曾经历过严重的危机,如“国旗事件”、“注册风波”等,一度使它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但最后都涉险而过,其中的缘由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上述这些观点都是从具体的史料分析中得来,客观、中肯,令人信服。这部厚重而有创见的校史著作的出版,无论对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还是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与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是为序。

前 言

熊月之 周 武

本书讲述的是圣约翰大学校史，一所已消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教会大学的历史。除了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白发苍苍的校友和少数研究者外，如今了解和熟悉圣约翰大学往事的人已寥落无几。当年洒落在茂林浅草中的校园建筑大多犹在，但早已陈漆斑剥、物是人非，失却往日的神韵，那花园般的校园和洋派十足的校风也早已渺不可寻，就连梵王渡这个地名也在时代变迁中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可是，在上海城市历史上，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圣约翰大学却一直声名洋溢，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和梦想。它以“光和真理”为校训，在万商之海中筑起一座令人沉醉的精神殿堂。

圣约翰地处沪西梵王渡，距外滩 5 英里。这里，三面临河，绿树掩映，碧草如茵，风景之佳，堪与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校园媲美；这里，拥有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最现代的教学设施，最先进的教学理念，最健全的大学管理制度；这里，拥有出色的师资队伍，丰富的校园生活和校园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它是教会大学的一面旗帜，享有“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江南教会第一学府”等美誉。从这里走出的政界精英、商界巨子、学界泰斗、医界圣手，如繁星缀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鲜亮的印痕。

这样一所大学，本身就是一道永恒的风景，不应该仅仅伫立在校友的记忆中，更不应该长久地被历史遗忘。

圣约翰大学从 1879 年创设，到 1952 年 9 月被裁撤，持续 73 年，大致

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879 年到 1905 年,是其草创期,也可说是从书院到大学的转制期。圣约翰建立之初,只是一个书院,虽并入圣公会此前在上海设立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然规模仍属简陋,教室容量极小,礼堂才占屋二三间。至于自然科学之仪器标本,更付阙如。且因是时英文之应用极少,学者仅资洋商;故各科均用中国言语教授,初用普通国语,继以学生大半来自苏省,改用本地方言。学生除少数研究神学者外,仅有中学程度”。^① 尽管其创办人施约瑟早在 1875 年就曾向圣公会布道部提出在华建立一所大学,1877 年又在圣公会布道部的机关刊物《布道精神》上撰文,呼吁筹集 10 万美元在华创办一所教会大学,并把它视作圣公会在华宣教事业的一个新的转折,但施约瑟本人长于学术,短于行政,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圣约翰并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大学。1888 年卜舫济受命长校后,开始对书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扩充校舍,强化英语教学,将英语教学列为各科之首,逐渐使英语成为圣约翰的教学语言,“自是学校逐渐发展,中学毕业学生,有愿留校进修高等学程者”。1892 年学校乃添设正馆,教授大学课程。这是圣约翰从书院迈向大学的第一步。1896 年卜舫济以在美募款所得 15 000 美元及中国所捐 4 000 银两建成大学校舍一所,名格致室,聘顾斐德为理科主任教授,并将大学生与中学生实行分别教授管理。至此,圣约翰初步形成了以文理科为主,兼设医科、神学科、预科的教学格局。此后,学校图书馆(即罗氏图书馆)、科学馆、运动场及宿舍等次第建成,设施粗具规模,并日臻完善。为了解决学生的学位问题,1905 年圣约翰依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改组为完全大学,并于次年在美国华盛顿注册之后,圣约翰正式升格为大学,设置文、理、医、神四科,各科毕业生“得授予美国大学毕业同等之学位”^②。从书院到大学,圣约翰用了 26 年时间,走的是一条渐进的改良之路。

第二阶段:从 1905 年到 1925 年,是圣约翰大学的黄金时代。圣约翰升格为大学后,在卜舫济校长的卓越领导下,体制日臻完善。

① 《卜舫济记圣约翰大学沿革》,朱有曦、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4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6 页。

② 《卜舫济记圣约翰大学沿革》,朱有曦、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4 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8 页。



其一,1911年学校将文理科分为文科和理科两个独立的学科,率先实行学分制和学衔制。1913年添设大学院,招收硕士研究生,形成预科、本科、大学院三级教学模式。

其二,逐渐从分斋制过渡到院系制。与早期的许多新式学校一样,圣约翰最初亦采取分斋制教学模式,即中学与西学分斋而设,各斋内分设若干系科,各斋均有正馆和备馆之别。其中,正馆相当于大学阶段,备馆则相当于大学预科(后发展为圣约翰大学附中)。这样的阶段划分在各斋内更具意义,即中学斋备馆毕业升入中学斋正馆,西学斋备馆毕业升入西学斋正馆。作为中国教育领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处理中西学关系的特殊教学模式,中西学分斋制的问世与存续有其自身的理由:它使得由传统中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开始让位于中西两学共同执掌教鞭、分享教坛的新格局。借助于西学教学的引入,它打破了中学以外无学问的虚骄心理。但是,在中西学系科与课程数量过于悬殊的对比下,这种模式毕竟给人过于强烈的感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似乎中学天地真是那么狭窄,而西学的领域却是那么辽阔,客观上容易助长西洋至上的崇洋倾向和妄自菲薄的心理。而且,将中西学人为分割的教学模式,并不符合学问本身客观存在的内在联系,也不利于学问和知识本身的健康发展与正常传授。因此,随着中西文化数十年的交流与融合,在学科建设和师资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不少新式学校纷纷摈弃畛域之见,由分庭抗礼式的分斋教学,走向严格按学科本身分类的院系体制,并在此模式下实行分科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课程与教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1919学年,《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尽管依然保留西学科、中学科的说法,但在其目录相关栏目中,“分科”一词却取代了以往的“分斋分科”。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微妙变化,传达出圣约翰即将告别行之已久的中西学分斋模式的重要信息。从1920年代初期开始,圣约翰加快了在院系制模式下系科建设的步伐,逐渐从中西学分斋制过渡到院系制下的分科教学。

其三,加强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充实自己的教学力量。譬如,1914年圣约翰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医科学会签署协议,将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与圣约翰医学院合并,更名为“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简称“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通过合作,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不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获得宾夕法尼亚医科学会的指导,毕业生亦可入宾夕法尼亚医学

院深造。

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完善,圣约翰逐步确立了自成一体的大学教育体系,这就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一种体制的保障。正是在这种大学教育体制的保障下,圣约翰的教育质量迅速提高,在中国教会大学中声誉鹊起,成为学子趋之若鹜、蜚声海内外的名校。

伴随学校声誉的提升,学校规模亦逐年扩大。1907年学校建造学生宿舍,以纪念因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外籍教员孟嘉德。1911年学校购买位于吴家宅之地,为此筹得白银14万两,共计土地72亩,这笔款项由多次多方筹得,部分来自母会的资助,部分由卜舫济赴美演说筹款所得,剩下采用借款的方法。处于苏州河左岸的吴家宅与圣约翰原先的校园隔河相对,草木郁郁葱葱,非常适合作为校园之用。学校在购得这块地皮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建设。1913年,为纪念卜舫济任校长25周年,社会各界捐款建造图书馆。1917年学校进行校门改建。1918年,洛克菲勒驻华基金会捐金8万元,学校用来建造新科学馆一座,其建筑采用东方传统风格,共三层,供化学系、生物系、物理系使用。1919年学校建成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馆——顾斐德体育室,内设游泳池、健身房、球场,同年,由同学会捐助建造交谊厅纪念已故的卜舫济夫人黄素娥。1920年由美富商遗孀西门夫人捐款,另建造学生宿舍一座,名为西门堂。

图书设备方面,圣约翰罗氏图书馆以英文藏书多而闻名,曾接受时任纽约市长及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罗氏的捐赠书籍,因此以罗氏图书馆命名。1915年,学校新图书馆落成,分为上下两层,楼上陈列图书,分藏书室与阅书室,采用公开阅览制度,人人可以自由浏览书籍^①。据1922年统计,图书馆有英文书籍11800册,中文书籍8000册,英文杂志80种,中文杂志20种^②。这些书籍有赖于社会各界的捐助,其中包括海外如美国京卡内基学会、美国教会定期刊出版会,国内私人如两江总督周馥、校友宋子文,机构如江南制造局、商务印书馆等。

第三阶段:1925年到1952年,可以说是圣约翰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国旗事件”,“立案”争端,战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圣约翰大学学生

①②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



群情激愤,于6月3日在大礼堂集会抗议,遭到校长卜舫济的干涉,把升在旗杆上的中国国旗扯下,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学生及员工相率离校,于8月另组光华大学。这就是所谓的“国旗事件”。这一事件是圣约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潮,也是学校发展史上的一座分水岭。“国旗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众说纷纭,卜舫济因此受到社会的非议与责难,圣约翰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在校人数及报考人数骤减,“学校几有不可终日之势”。^① 1925年9月圣约翰重新开学时,学生锐减到400多人。这直接影响到学费收入,经费严重紧缺。卜舫济不得不返美筹集资金,直至次年景况才有所好转。

对圣约翰大学的发展而言,旷日持久的“立案”争端,比“国旗事件”更严重地损及圣约翰的声誉和地位。晚清时期,政府对外人在中国设学一直采取放任态度,1906年学部通过的“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中,明确规定:“外人在各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立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无庸立案”^②。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非基运动”蓬勃展开,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教会学校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强烈的质疑,在一片“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中,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5年11月16日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示认可办法》,其中规定:1. 外人所设学校遵照教育部法规办理者,可按规则向教育行政官厅请示认可;2. 学校名称应冠以私立字样;3. 学校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必须以中国人充当副校长;4. 学校董事会中中国人应过半数;5. 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6. 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所有教会学校都必须按照上述办法办理立案。对此,圣公会上海教区郭斐蔚主教和校长卜舫济以美国政教分离为依据,认为向政府立案将妨碍学校的宗教和学术自由,因而采取抵制态度,拒不向中国政府立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坚持所有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立案,并且态度日趋强硬。1931年,政府宣布,没有注册的学校,在新学年开始时不允许再行招生,

① 汪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载《“圣约翰大学”建校一百二十五周年暨上海校友会成立二十周年》,第21页。

②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077页。

形势对圣约翰极为不利。卜舫济开始考虑立案问题,于同年夏天递出第一份立案申请。由于种种原因,圣约翰的申请直到1947年才获准立案。延续二十余年的立案争端,造成圣约翰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其成为各种民族主义攻击的众矢之的,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声誉。

近代中国四海不靖,绵延不绝的战乱对圣约翰大学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虽然,圣约翰地处海上梵王渡,没有像中国其他大学那样四处播迁,但持续的战乱还是深刻地影响了圣约翰正常的教学秩序。1927年北伐军抵沪,圣约翰大学除神学院、医学院仅14人继续上课外,其他院系及高中部一度宣告停办,大部分美籍教师回国,华籍教师及少数留在上海的外籍教师为维持学生学业起见,临时开办“丁卯补习学社”,迁地上课,一年后才在原址复校。1937年抗战军兴,圣约翰大学无法照常上课,与之江、东吴、沪江等校合办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亦称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并与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作,校址设在大陆商场(后称慈淑大楼)楼上,上午归大学部上课,下午则让给高中部及圣玛利亚女中上课。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半,直到1939年9月,圣约翰才迁回原址。

圣约翰虽然迁回原址,但校政则迭经变更。1941年,主持校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卜舫济辞去校长职务,改任名誉校长,中国人沈嗣良继任校长,卜舫济的儿子卜其吉以上海教区代表身份充任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沈嗣良因“通敌”嫌疑一度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1946年10月,曾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涂羽卿受聘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1948年涂羽卿辞职,校董会临时设立由吴清泰、卜其吉(代理副校长)、赵修鸿(代理教务长)、倪葆春(医学院院长)及德爱莲组成的校政委员会,行使校长职责。不久,卜其吉被校董会正式任命为副校长,掌理校政。1949年1月,卜其吉辞职,物理学教授赵修鸿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学校其他重要行政岗位也都由中国人担任,至此,圣约翰大学已“完全处在中国人的行政管理之下”。

上海解放后,圣约翰大学设立了由15人组成的新校政委员会,杨宽麟、潘世兹分任正、副主任。1952年秋,圣约翰和其他教会大学一样被裁撤,其医学院并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工学院土木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教育系和理学院并入华东师大,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经济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外语、新闻、历史等系并入复旦大学,中学部与大同大学附属中



学两校合并,成立五四中学。原校址归华东政法学院使用。圣约翰大学遂成为历史名词。

二

中国之有大学,自教会大学始。中国之有教会大学,则自圣约翰大学始。在总共 73 年的办学历程中,圣约翰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传统,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小规模办学与非职业化的学校定位

圣约翰大学自立校之始,就坚持小规模办学和非职业化的学校定位,这一点构成圣约翰的显著特色。

建校之初,圣约翰大学每学期在学学生人数不满百人,1879 年为 39 人,10 年后只增到 70 多人,直到 1895 年,全校学生才达到 127 名。在建校 50 周年之前,最多的一年也不过 750 人,而且学生入学后,读完中学、大学全程的比率偏低,不少学生读完高中并不续读大学,或是转到别的大学,还有一些只读了大学一、二年级便离开。这种淘汰率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校对学生的考核相当严格,一部分学生感到学习跟不上,因而中途辍学或转学,另一方面由于收费较高,有些学生由于家庭经济不宽裕,不能读完全程。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富裕的学生,只在校学习一段时间,主要用于学习英文,然后出国。驰名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就是在圣约翰读完高中又读了一年大学后出国的。这样的结果是拿到学位的人数并不很多,1927 年《约翰年刊》上刊登过一篇《老约翰所造就之人材》的文章,汇总了 1925 年之前约大所获得学位的人数及专业分布:

约翰虽有东方哈佛之号。自 1879 年开办至今,已历四十有八年,为中国最早之大学。此半世纪中,所造就之人才,何止千数。惟人数众多,调查每难正确。记者谨细计 1925 年章程所载校友名录,共得七百九十三人。平均计之,每年得十又七人。此项校友凡在大学毕业或未毕业而得学位于他校者,皆属之。惟不得学位者不与焉。^①

^① 引自 1927 年《约翰年刊》,第 121 页。

从所列数字看,到1925年,总共有793人获得学位,每年平均仅有17人,这个数字是很低的。793人中,获学士学位者共655人、获硕士学位者104人、获博士学位者43人。从专业的分布来看,以文科、理科、医科的人数居多。

这种状况到1939年后才有所改变。当时由于处在抗战期间,上海许多高校内迁,圣约翰大学留沪未迁,所以向学青年大量考入。据统计,1943年学生人数(包括研究院、大学部和高中部)达2800多人,教职工也大为增加。以后学生人数历年均在2000以上。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学生数约为1800余人,高中部不及1000人。纵然如此,圣约翰大学历年的大学毕业生总数也不过6500人,平均每年不足100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圣约翰长期坚持小规模办学的理念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

在中国现代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无论是财力还是师源、生源都更有条件扩大办学规模,但它拒绝这样做。在校方看来,大学不仅是学生求学的地方,它还应该充满着浓郁的基督教大家庭氛围,师生之间不能只在课堂相见,更应该在课外时空建立和保持亲密的、经常性的联系和接触,如切磋学业、举行各类课外活动,甚至到住校教员家中定期或不定期聚会等,这样,学校规模和学生数量就不能过于庞大,否则就有可能影响师生间相互联系的直接性与密切性程度。这一点,《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中特别提到:

(学校)对于招收新生,抱严格主义。故大学学生,不得过400人;中学学生,不得过250人。人数较少,则师生间之接触愈多,知识上之增加更速。此种较小之大学,对于中国,贡献必多。

卜舛济更明确地指出:“我们一定不能让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发展得过大,以致牺牲对学生的个人影响这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目标是较小的学校,保证质量,而不求数量。这将会像发酵的力量,可对整个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样要比因学生人数众多,教师很少与学生接触而无法施加影响要好得多。”^①

坚持小规模办学原则,在当时背景下,并非易事。因为小规模办学势必影响学校财源,作为圣公会一个教派独立支撑的教会大学,圣约翰虽有

^① 费玛丽著,王东波译:《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教会的拨款,但实际上更仰赖学费。以学校前 35 年为例,教会拨款占全年收入的比例,有 11 个学年维持在 10% 以上,14 个学年为 10% 以下,其中有一个学年仅占 3.81%;超过 50% 和 40% 的各有 3 个学年,超过 20%—30% 的有 4 个学年。这表明圣约翰大学的维持主要依靠学费。然而,圣约翰从未有过以“扩招”增加学费收入、渡过经费难关的想法和做法。只是在抗战时期及其以后,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才不得不稍稍放宽多年来所抱持的“严格主义”,招生的数量有所增加。

圣约翰的这种坚持,在学额供不应求的背景下,抬高了录取门槛,确保了生源质量,也使得师生比例维持在比较合理的水平。以 1933 年为例,其师生比为 1:13,据中华基督教协进会言,这样的师生比接近了当时美国国内的水平,它既有利于师生间的密切接触,也不至于浪费教育资源。

非职业化学校定位,深刻影响着圣约翰大学的格局和气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职业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有人以实用主义为准绳,批评圣约翰的课程与教学“殊少实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建议其设立各类职业课程,理由是教育宗旨“在使人各有一业,否则教育为无用”。对这样的意见,卜舛济并不以为然,他认为教育的最重大使命在于“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他在《约翰声》撰文指出:

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教育应当以道德上之价值为其总枢。人类之兴趣愈多,则胸襟愈广,生命之博大无涯,渊深无极。如果减少其他兴趣,而使其专注于一种以求实用,其用固甚小,而人之生命且为之减窄。不学之人如蛙在井,以为世界如是已耳。学则其眼光之大小,随所学之程度而转移。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于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应当置之于后。

性格之培养者,意为超越个人物质与金钱之欲望。而提倡职业教育者虽然并非不知道教育培养性格之职能,但是他们却聚生徒于一堂,每天讲求可以赚钱之道,那么学生忖度教育价值,怎么不以银圆铜币为本位呢?那些函授学校之广告,更是直截了当地鼓吹何科读之可以致富、何技习之可得厚薪。这些都足以动摇学生的道德心

性。如果这种精神支配了学校,那么为人之道,岂不是不外乎致富吗?学校就是一个小的宇宙。学生居于其中,务使发达其天性,高尚其人格。人与人之关系,及社会上之自觉,均应勉导之。所以,圣约翰大学教育之宗旨,在于造就学生为完全国民,使之以国利民服为前提,以克己自治为本领。其意志必高,其识见必广。并使其自知人为灵性动物,凡作一事,必令灵性满意。

卜舫济不但无法认同“职业教育论者”的主张,而且认为那些主张对教育而言是一种至大危险:

职业教育论者以求教育适用之故,而认为教育全体胥在乎此,则吾人视为至大危险。吾人坚持以上二,务使所施之教育,于道德上及教育之真义上确有价值,而造成人类最高之性格焉。

以“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作为大学的最高使命,是卜舫济毕生持守的“大学理念”。由于他长期担任圣约翰校长,这种“大学理念”非常自然地使圣约翰自外于现代中国职业教育潮流,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乃至现代中国大学中独树一帜。圣约翰大学之成为现代中国绅士的摇篮,可以说就是这种理念的产物。

圣约翰恪守的小规模办学和非职业化定位,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圣约翰从一所普通书院发展成为顶尖名校,无疑与这一坚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2. 地道的英语教学

教会学校通常都会重视英语教学。在这一点上,圣约翰大学是先行者,也是矢志不渝的力行者。

圣约翰立校之初,就十分重视英语教育。1888年,卜舫济就任圣约翰书院院长,更加重视英语教学。他提出,现代教育通过教导学生观察、实验、运用思考来作出判断,必然将引发一场伟大的知识革命。英语作为传播新教育之利器,是将现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关键。他援引欧洲文艺复兴的事例来说明英语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希腊文学被输入到欧洲,日本复兴的部分原因则是它采用英语作为媒体输入西方思想,中国文明已经达到顶点,现在开始衰落和死亡,必须将西方的一切宝藏都给予中国才能令其复苏,而要将西方宝藏输入中国,以汉语作为媒体显然不行,因为不能用旧瓶装新酒。不掌握西方语言,就不可



能掌握西方思想。他表示,英语是教学的媒介,现代科学、数学、欧洲史、经济学、逻辑学等新型学科都要用英语的教科书^①。他特别向教会提出大力推行英语教育的建议,认为“英语教学的重要性在于:一、华人研究英文,有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二、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三、华人之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间之情感,并可以扩张国际贸易;四、研究英文,可以使华人明了基督教事业,在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五、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②

基于这种认识,卜舫济就任校长后,便在圣约翰大力推行英语教学,逐步将英语变成教学语言。1890年以前,鉴于学生的英语程度有限,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课程,仍用中文讲授,卜舫济本人授课也不得不如此。1890年以后,顾斐德来到学校,担任科学系主任,学校所有科学课程开始用英语讲授。1896年,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向圣公会布道部提交备忘录,规定圣约翰医学院、神学院全部采用英语教学。此后,学校除国文课程外,一律用英文课本,以英语授课。

圣约翰的英语教学非常成功,英语教学成了圣约翰大学最为人们称道的特色,以至于在时人心目中把能说一口纯粹的英语视为圣约翰学生的典型标志。1929年11月22日出版的《约翰周刊》如是说:

圣约翰学生与众不同的最大标志是他们地道的英语。本校因此而远近闻名,令人羡慕;圣约翰学生也因此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毫不夸张地说,一些学生甚至发展到对中文书刊不屑一顾的地步。在本校,中文演讲往往令人厌倦,中文告示也常常无人注意。在谈话时,学生们认为他们用英语更加轻松自如,即使用中文交谈,如果不夹杂几句英文,那将是不可思议的事。^③

圣约翰英语教学名闻遐迩。圣约翰学生都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当年许多洋务部门如海关、电报局、洋行以及外交部门也因此而对圣约翰的学生另眼相看,以至于社会上竟有所谓“圣约翰英语”之称。

① 徐以骅:《卜舫济自述》,载上海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6辑,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②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

③ 转引自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页。